

《世风士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风士像》

13位ISBN编号：9787108044372

10位ISBN编号：7108044374

出版时间：2013-7-1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李村

页数：3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世风士像》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政治可以称作“文人政治”，现代史上，许多人在政学两界出入频繁。这部随笔集从胡适之谈起，评述民国时期的政学名人，虽内容分散，涉及人物众多，但有一个相互联系的主题，即探讨现代史上的政学关系。书中谈及的诸多往事一度尘封，作者广征博引，以缜密的判断和功力深厚的笔触，抽丝剥茧，层层梳理被忽略的历史细节，让那些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见。

（推介语）

李村没有村气，肚皮里的书多，腹笥宽，文字有民国范儿。

——张鸣

平淡之笔墨，中正之眼光，坦诚之态度，幽深之情怀，不动声色中见史家之气象。

——孙郁

以随笔体写民国学人从政，实非随笔而成，所言均人所不知，或人所少知，广稽博采，娓娓道来，言必求其据，事必求其真，因而有很高的可信度，可作历史读，亦可作掌故读。

——杨天石

李村先生前著《前人后事》对一些鲜有人关注的史事已有较深钩沉，《世风士像》一书更聚焦现代史上“政学”交集之处，贯穿中国传统的“文人政治”视野，颇具敏锐之问题意识。虽是随笔集，却见大眼光。

——叶隽

《世风士像》

作者简介

李村，本名辛晓征，文学评论家。1982年起，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百余万字，著有《光荣与颓唐》、《国民性的缔造者——鲁迅》、《中国文学理论学术史》（第二卷）、《前人后事》。

书籍目录

目录
真伪难辨
胡适与宋子文
再说胡适与宋子文
胡适1949年赴美之行
胡适为什么不做行政院长
胡适与“第三党”问题
胡适与“第三势力”
“吴国桢事件”中的胡适
胡适是学者还是政客
胡适的胸襟与气度
师生之道
书生从政
傅斯年书生误国
再说傅斯年书生误国
蒋介石的错误：说翁文灏
我看何廉这个人
从蒋廷黻说起
不失书生本色
学者从政之后
宋子文的傲慢
马寅初、傅斯年、费巩：同罪不同罚
偏听则明，兼听则暗
世事难料
历史不能轻信
书生情是一张纸
顾维钧的结局
早期留美学生之“兄弟会”
我所知道的王造时
有关王造时的补记
吴国桢与叶公超
秦德君、茅盾、穆济波
刘尊一与潘宜之
世风士像
林庚白其人
吴虞与吴宓
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
政学之间
学者之间的应酬
五四以后的新旧之争
后记
续后记

《世风士像》

精彩短评

- 1、4月30日在六里桥法律出版社买的
- 2、知识人如何在政治与良心之间寻求平衡，这是胡适时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知识人要思考与学习的
- 3、如果耐心读完此书，定会发现作者确实功力深厚，史料运用自如，行文确实有民国范儿，时而令人慨叹，时而令人捧腹，“书生情是一张纸”令人印象极为深刻。刘尊一与潘宜之的往事也确实值得一读。
- 4、学界人物与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是后来才建立起来的
- 5、感觉是，“哦，原来是这样”
- 6、看到了一些新东西
- 7、“不动声色而见气象。”
- 8、我想读这本书 2016-10-12
- 9、了解民国文人的从政史，以胡适为代表。

章节试读

1、《世风士像》的笔记-第303页

后记

对于一般人来说，人过了五十岁，就可以看见生命的尽头了。唐朝诗人元稹写过一首《看花》：“努力少年求好官，好花须是少年看。君到老大逢花树，未折一枝心已阑。”人到了这种年纪，我想最适合做的事，大概就是理理旧书，想想陈年往事，沧桑如对故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延长与生命尽头的距离。

不过我没想到，写完《前人后事》以后，这么快又写完了第二本。因为随笔虽然只是“随便写几笔”，记录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但是对知识性、趣味性都有很高的要求。我认为好的随笔，还要有一定的学术性，甚至还要有好的文笔。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随事点染，益人以智。而我不是专业作家，没有足够的资料，平时读书又随看随弃，再搜集求证就很困难。所以在写这些文章时，只能因陋就简，依靠身边仅有的材料，其他的只好凭记忆。

这本书中的文章，大部分是写现代史上的政学关系，其中有关胡适的最多。有些与胡适无关的题目，也有涉及胡适的内容。我也知道，近些年来，有关胡适的文章、著述，已经写得连篇累牍，令人不厌其烦，连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也喜欢以胡适为题，做硕士、博士论文。我曾经问过他们当中的几位，你为什么要选胡适呢？他们的回答是，胡适的思想比较单纯，文章也比较浅显，容易把握。这真让我大吃一惊。因为在我看来，胡适是现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他的思想与人格都比鲁迅要复杂得多，决不是“自由主义者”这几个字能够概括的。他从“暴得大名”以后，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地位都举足轻重，在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上，涉及内情之深，参与决策之要，都是现在还无法定论的。特别是他一生的交往，从杜威到梁启超，从陈独秀到汪精卫，从罗斯福到蒋介石，都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与蒋介石的“君臣遇合”，甚至有许多难解之谜。因此他的经历与识见，我们根本无法企及。但是正因为这样，胡适也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只要谈到现代史上的政学关系，你首先就要遇到胡适。而且几十年来，胡适和鲁迅一样都被刻意偶像化了，既成了官方表彰的“圣贤”，也成了民间供奉的“神祇”，本身就存在着对立的价值观，真实面目更难以辨认。所以既然是难题，就不能妄下结论。即便这样，这些文章仍然会有先后矛盾的地方。因为我在写这些文章时，经常发现我对胡适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因此，这些文章只是我个人的浅见，不当之处，还有待专家指教。这就是我在后记要说明的。

写完这篇后记，北京就快进入深秋了。秋天是一年最隆重的季节，也是北京最好的季节。人在秋天里，最应当有感恩的心理。而我此时最应当感恩的，就是出版社。虽然我还不不知哪个出版社愿意出我这本书，但还是要将谢意先写在这里，以表达对秋天的诚意。

2011年10月25日于李村

2、《世风士像》的笔记-第71页

胡适的胸襟与气度

胡适的胸襟与气度，一向有口皆碑。胡适自己说，他被人骂了一辈子，但是他“统统都不记得了”。他晚年还借用自己老师的话，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被后来的自由主义者当作思想宝典。有些人还喜欢拿他与鲁迅作对比，以证明鲁迅的狭隘。这些观点我都不反对。但是胡适毕竟不是圣人，也有气度不足、胸襟狭窄的时候。

我最初有这个印象，来自他对梁启超的态度。

1922年11月，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邀请，在北大礼堂做了两天的讲演，题目是《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他在讲演时，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了一些批评，认为这部书瑕瑜参半，既有“石破天惊的伟论”，也有“浅薄或谬误”。其中“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而且

还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把思想的来源抹煞得太过”；二是“写时代背景太不对了”。胡适听完后虽然表现得很有风度，现场做了40分钟答辩，令听众“如醉如狂”，但是心里非常不快，一连三天在日记里发泄不满，指责梁启超“不通人情世故”。他还在给陈独秀的信里，说梁启超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真是既没有容忍，也没有气度。

当然这件事过去后，两人并没有因此结怨。双方的来往反而更为密切，胡适还被外界怀疑为“研究系”。但是梁启超病逝后，他又在日记里提起这件事，而且口气中表现出另一种傲慢。他说梁启超待人处世，都有“天真烂漫之处”，他这次来北大挑衅，就是出于“争胜”的心理，要与自己一争高下，可见梁启超在老惫之后还是争强好胜，“一团孩子气”。他对梁启超一生的评价，也同样非常刻薄，说“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统系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一生著述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出一篇一节”。胡适提起老一辈学者，总是表现出一副优越感，喜欢说他们缺少“统系的训练”，他对蔡元培的评价，不多不少也是这几个字。实话说，我不知道他所谓“统系的训练”具体指的是什么，是必须掌握几门学科，还是要懂得几种语言？但是以他的学识，说梁启超、蔡元培缺少“统系的训练”，总觉得有些大言不惭，有些说不出的滑稽。我以为他对梁启超的评价，反倒恰好用来自评。

这些话可能说远了。再回到正题——让我加深这个印象的，是钱穆《师友杂忆》里提起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更滑稽了，尤其可以看出胡适的小器。1928年钱穆在苏州中学执教时，有一次，校方请胡适来学校演讲。当时以胡适的鼎鼎大名，能到外地中学演讲，自然是件大事。演讲开始前，校长汪懋祖见钱穆也坐在台下，便请他到台上来，介绍给胡适。胡适见了钱穆，一开始还很高兴，说了些“久闻大名”之类，又取出一封信为证，信是胡适的一位朋友写的，提醒他到了苏州，不要忘了两件事，一是买一部江湜的《伏菟堂集》，再就是见见钱穆。不料钱穆“书生不习世故”，相见之下有些冒失。他当时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里面涉及《史记六国年表》一书，他没见过这部书，心里“积疑积闷已久”，料想胡适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一定见多识广，便问胡适是否见过？想不到胡适经不起这一问，当下语塞，表情很不自在。演讲一结束，便急着回上海。汪懋祖一再挽留，他还是执意要走，好像生怕钱穆又不识趣，再给他出什么难题，令自己一世英名毁在一个中学教员手里。钱穆后来说起这件事，很过意不去，觉得“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对胡适有些“失礼”。但是他出的这道“难题”，已经在胡适身上得出了结论：自由主义这副“圣药”，同样治不了中国人好面子的顽症。

其实人的见识有限，一个人学识再富，也会有所不知。不知道或者没看过某一本书，根本算不上什么丑事。以现代学者为例，傅增湘是著名的藏书家，却不知道《乌台随笔》是元人王恽所作；钱基博号称博雅，写过一本《古籍举要》，里面却不知道《名山藏》是明代何乔远的作品；王国维学问更大、著作也更精审，但在《两浙古本考》里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将宋人高闾的《高氏春秋解》误认作《高诱吕氏春秋解》。但胡适于这件事始终不能释怀，后来对钱穆也是敬而远之。钱穆将两人的关系比作颜斤蜀见齐宣王：“王曰斤蜀前，斤蜀曰王前，终不前。”钱穆来北大任教后，相互间的芥蒂又进一步扩大，演变成学术立场的对立，“课堂所言正相反”。两人公开发表的争论，是有关老子的生卒年问题。据钱穆说，他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胡适，说你既然认为任何思想都不是孤立的，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又认为老子早于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物，为什么在讨论老子的思想时，要上推到《诗经》，“就《诗经》来论时代背景？”他还在课堂上批评胡适的《说儒》，说胡适不辨句读，将《说文》对“儒”字的解释，误解为“儒术尚柔”，作为“初儒皆殷遗民”的证据，这都让胡适更加难堪。胡适的态度也影响了傅斯年。钱穆的弟子钱树棠先生说，钱穆曾告诉他，他刚来北大时，傅斯年宴请外国学者有时还请他作陪，向外国学者介绍“钱先生是某文、某书的作者”，待他的《国史大纲》出版后，有人问傅：这本书怎样？傅斯年很不屑地回答：“这人写的东西，我从来不看。”所以胡、傅两人在世时，钱穆始终不能当选“中研院”院士，甚至进入不了候选名单，这对钱穆是很不公道的。钱穆对此也是耿耿于怀。据严耕望说，1966年“中研院”同意提名钱穆为候选人，他将这一消息告诉钱穆时，钱穆断然表示拒绝，相当愤恨地说：“民国37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严耕望一再劝解，说“门户之见，自古而然”，“但先生终不同意”，他只好通知史语所撤销提名。

说到中研院院士，我又想起另一个例子，更能说明胡适的狭隘、小器。那就是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时，他提交的候选人名单，竟然将冯友兰排除在外。根据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的规定，首届中研院院士选

《世风士像》

举要经过五次投票，最后由评议会确定。最初提出的402位候选人名单，是由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专门学会、各研究机构和一些知名学者分学科推荐的。胡适作为北大校长、中研院评议员，被推选为选举筹备委员，负责推荐和评选“人文组”的候选人。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是：

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后来又增补了一位陈康)；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系：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组”的范围除了以上学科，还包括人文地理和民族学。胡适说他在这两部分“想不出人名”，没有提出人选。

从表面上看，他提出的这份候选人名单，兼收并蓄，没有显著问题。但是对照正式当选的首届院士名单，就会发现立场狭隘，问题很多，许多重要学者都没有被纳入他推荐的名单里，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冯友兰。冯友兰的学术地位，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他在《新理学》之后，又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哲学简史》，已经是海内外公认的中国哲学代表人物。胡适在学术界一向以“大公无私”著称，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他将冯友兰排斥在外很令人难以理解。

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私心作怪，胸襟出了问题。说起来，冯友兰也是胡适的学生。但是两人的关系一向比较疏远，《胡适来往书信集》里只收有冯友兰早年的一封信，以后便无往来，而且两人在师生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相互“争胜”的关系，经常因为意见不同、观点不一致，相互攻讦、指摘。据郑朝宗说，他在清华读书时，听到过不少“批评适之先生的话”，而冯友兰“因为教得是中国哲学史，所以有时也批评胡适先生”。例如有一次，冯友兰说：“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样的远啊！”

同样，胡适也不甘示弱，经常用“洗脚戏门生”的口吻，在北大讲台上羞辱、驳斥冯友兰，说冯友兰是“天下最蠢的蠢人”。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便说过胡适对他有关老子生卒年的见解“耿耿于怀”，有一次在课堂上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我相信冯友兰在引述这段话时，已经有所保留，胡适的原话一定说得更刻薄。何炳棣在《读书阅史六十年》中说，1947年冯友兰在纽约时，有一天，他去看冯友兰，说起有位朋友正在写关于胡适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冯友兰听了，立刻“急不能待”地说：“这个题目很好，因为1927年以后，他就没得影响了。”何炳棣在后面评论说，“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讥胡要比胡之讥冯温和多了”。胡适刻薄冯友兰的话，何炳棣想必从胡适嘴上听过不少，只是他没有举例，我一下子也找不到实证。不过我相信这种“文人相讥”的场面，双方一定时有发生。客观地说，两人的相互批评主要还是学术论辩，只是中间又不乏个人意气。例如胡适在1950年以后本来已经脱离了国内的学术环境，大可以不争这份闲气了，但他还是放不下冯友兰，在日记里说：“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1月，他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有关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书评后，又在日记里补了一句：“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这里谈的固然是学术，但是意气之盛、偏见之深，每每溢于言表。这些偏见和意气流露太多，就免不了伤及私人感情。《朱自清日记》1933年8月记：“芝生谓胡先生近有一文驳芝生、颉刚、钱宾四三人老子年代之说，甚至感情。余见芝生动感情，此犹是第一次也。”胡适在晚年谈话录里说：“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觉得他们的聪明太无聊了。”话说得真漂亮，但我怀疑胡适自己的聪明，是否都用得得当？胡适在晚年谈话录里还说过一句话：“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处。”我想，至少在对待冯友兰的态度上，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很合适。

当然，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胡适没有将冯友兰列入名单，完全是出于学术立场，这里面不存在个人成见问题。因为胡适提出的名单不仅没有冯友兰，也没有顾颉刚，他反而推荐了郭沫若。顾

《世风士像》

顾颉刚既是他的得意弟子，也是新史学的开拓者，而郭沫若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就有意与他为敌，在政治和学术立场上都站在他的对立面。这就证明了胡适的“大公无私”。我认为事情恰恰相反。胡适提名郭沫若，正好暴露了他心胸狭窄的另一面，也就是“伪善”。就学术而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和西周史研究的确影响很大，风靡一时，但是许多结论粗制滥造，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误解文献的例子更屡见不鲜，经常只有“大胆假设”，没有“小心求证”，一再上演“学术闹剧”。每一次推翻前说，都要先做一次自我批判，承认此前的说法是“相当严重的错误”，或“所犯的 error 相当严重”。所以大部分正派的史学家，都对他的史学持质疑态度。据说在评议会审查候选人名单时，郭沫若虽然通过了票选，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但是是以十三票对八票，在候选人中争议最大。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我不相信以胡适的眼光，真的会看中郭沫若。我认为他推荐郭沫若做候选人，主要是为了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推荐顾颉刚，使顾颉刚经过三次补选，才勉强进入候选人名单，我现在还难以理解，也不敢妄断。

胡适气量不足、心胸狭隘的事证，当然还不止这些。例如他说“陈寅恪就是记性好”，就经常被传为笑谈。但这些无关大体的事例，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故意贬低胡适，否认他的胸襟和气量。我要强调的是，自由主义绝不仅仅是政治命题，也是一种人格概念。即便以胡适的人格与胸襟，要做一个完美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容易。

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

《世风士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